

郭沫若研究札記

卜庆华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卜庆华 著

郭沫若研究札記

湖南大学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札记

卜庆华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双峰县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印张 245千字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统一书号：10412·2 定价：平装2.30元
精装3.00元

目 录

第 一 辑

- “飞向自由的王国” (1)
——郭沫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
- 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刍议 (16)
- 郭沫若早期教育思想初探 (27)
- 真挚深厚的友谊 (33)
——读周恩来给郭沫若的四封信
- 关于郭沫若被蒋介石通缉一事 (38)
- 瞿秋白的“创造社”论 (40)
- “鲁迅生前曾经骂了我一辈子”吗 (44)
- 郭沫若悼念鲁迅的两副挽联 (48)
- 郭沫若与高尔基 (51)
- 革命家品格之一例 (55)
- 少年当存揽辔澄清之志 (58)
——读《樱花书简》一得
- “谁也不敢碰他”吗 (61)

第 二 辑

关于郭沫若诗歌的创作方法.....	(64)
释《女神》.....	(72)
《女神》与《庄子》.....	(78)
“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	(82)
李大钊的早期著作与《女神》.....	(85)
“预言诗人”.....	(89)
邓中夏的一首《女神》体诗.....	(92)
解剖室中也有诗.....	(94)
——读郭沫若的《解剖室中》	
《孤山的梅花》与《瓶》.....	(97)
《夜半》与《牧歌》.....	(100)
关于“自比歌德”.....	(104)
郭沫若与殷夫.....	(109)
写剧·改诗·问学.....	(116)
郭沫若楹联注释商榷.....	(123)
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商榷之一.....	(130)
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商榷之二.....	(137)
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商榷之三.....	(144)
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质疑续补.....	(156)

《郭沫若少年诗稿》订补.....	(168)
修改文章四例.....	(179)
郭沫若创作所采神话考.....	(183)

第 三 辑

郭沫若的治学经验.....	(194)
郭沫若速解甲骨文之谜.....	(203)
郭沫若写论文神速的秘密.....	(206)
“勇敢与专精是成功的最大要素”	(209)
略谈古象的南迁.....	(211)
说“祖”字.....	(214)
孔子是个大力士.....	(215)
“扬杜抑李”和“扬李抑杜”	(217)
“沧海遗粟”	(224)
关于《读〈实庵字说〉》的修改.....	(226)
“实数”与“虚数”	(231)
诗歌称“首”与文章标“题”	(239)
郭沫若与图书馆.....	(241)
郭沫若部分笔名、别名、化名诠释.....	(249)
石鼓文古拓本解诂.....	(258)
郭沫若部分书名诠释.....	(259)

郭沫若考古著作十种·····	(274)
郭沫若历史论著略述·····	(280)
林伯渠、杜国庠赞《十批判书》·····	(283)
郭沫若古史研究订补·····	(286)

第 四 辑

郭沫若与宋庆龄是最后见到斯大林的中国人·····	(301)
郭沫若与闻一多的友谊·····	(302)
郭沫若赠田汉的一首诗·····	(307)
“终古馨香一片真”·····	(309)

——郭沫若悼念郁达夫兄弟的两首诗

郭沫若、于立群和邓拓的诗书交往·····	(311)
鲁迅和郭沫若的反《七步诗》·····	(313)
郭沫若与张一麟·····	(315)
郭沫若和翦伯赞“以文会友”·····	(319)
交友之道·····	(321)
奖掖后进之一例·····	(325)
小说《骑士》写作的前前后后·····	(327)
郭沫若给屠户写春联·····	(329)
郭沫若妙语赠侯宝林·····	(330)
体育引郭沫若走上诗坛·····	(331)

郭沫若的气功锻炼与研究	(334)
翻译科普巨著《生命之科学》	(337)
坐“花轿”的婚仪的由来及其发展	(338)
郭沫若读书的“狭义经验”	(341)
郭沫若给古人诊病	(342)
“登高振臂待诗人”	(343)
——郭沫若有关湖南的诗文	
郭沫若三到长沙	(349)
郭沫若在长沙书写的一副对联	(351)
图书馆，亲密的伙伴	(352)

“飞向自由的王国”

——郭沫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从香港潜来上海，与创造社的战友一道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翌年二月初，他把《水平线下》和《盲肠炎》等编为一集。作者在这部书的《序引》中说：

“在这部书里面具体的指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

“但从这一个人的变革应该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的变革——‘个’的变革只是‘全’的变革的反映。

雀鸟要飞跃的时候，它总要把身子放低。

这儿是飞跃的准备。

飞跃罢！我们飞向自由的王国！”

这是郭沫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后，对以往思想生活历程的一段总结，也是他继续奋进的誓言。火热的激情，诗一样的笔调，蕴含哲理的语句，充分表现了他那不断革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积极进取精神，文中所说“一个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应该走的路”，即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道路。五四运动以

来，我国许多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这一正确的道路。郭沫若就是在这道路上纵横驰骋的一名闯将。陈毅同志说他“很早就翻译马列主义的著作，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历史问题，成为一个开山的祖师”（《周恩来论文艺》上册）。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指出：“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宣传和忠实捍卫者”，“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认真总结这位文化巨人所走过的革命道路，研究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研究我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经验，这对于在文化战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必要的。

一、关于思想转变的标准

在研究郭沫若的思想发展道路时，关于郭沫若何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颇多争议的问题。近几年来，一些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复搜集资料，进行新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在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是：郭沫若经过北伐战争的实际考验以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的发表为标志。这种看法突破了仅从理论认识上去研究一个人思想发展过程的框框，更注重从社会实践及其对认识的检验来作出分析判断，这很有见地。可惜的是：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论点论据却未能令人满意。这固然由于史料不足（郭沫若自参加北伐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惟文艺上的作品少有，便是理论斗争的工作也差不多中断了”。〔《水平

线下·序引》），故可资研究的直接资料不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未能掌握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研究者对何谓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并无明确的认识，因此，所论郭沫若思想发展过程不能给人以全面深刻的印象，而且，在强调“北伐战争的实际考验”的意义时，常有意无意忽视了北伐前郭沫若在理论认识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甚至对“革命实践”也作了比较狭隘的理解。如一九二五年左右，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思想斗争实践，但研究者却轻轻一笔带过。根据这种情况，在具体论述郭沫若思想发展道路前，有对思想转变的标准加以科学说明的必要。

究竟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呢？列宁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

毫无疑问，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必须遵循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指明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的几点，可作为衡量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后，比较了这两个主义的不同部分：

“（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

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这段话全面地说明了共产主义者的特点，指出了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根本差别。由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正处在一九二四年以后的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以这个标准来分析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并指出其思想转变时与三民主义者的差别，是恰当而又必要的。

二、思想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有着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矛盾论》）。从郭沫若由

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发展过程来说，可分为“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基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成为比较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个阶段。这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即是他头脑中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地位的曲折斗争。

郭沫若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中度过的。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由商品输出为主发展到资本输出为主，和经济侵略相适应，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展开了瓜分中国的运动。民族矛盾的加深，中国人民反帝怒潮的高涨，激发起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先受过“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以后又赞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他正式登上文艺和政治舞台，则是在五四爱国运动兴起之后。这时，中国无产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激荡下，郭沫若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并有新的思想的萌芽。在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中，他声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我愿成个共产主义者”。这“在当时还没有第二人”（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他向“实现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三呼万岁，热情称赞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为“先驱者”，对深受美、日武装侵略之苦的俄罗斯人民充满同情……这说明他当时已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当然，这时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复杂的。有“诛奸锄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极端自由”的自由主义主张，有“纯文艺”的观点，“泛神论的思想是浓厚的”，但作为其主导思想的则是爱国主义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

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开展，“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郭沫若曾关注政治思想界的问题，并零星阅读过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文章，认识到“马克思与列宁终究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导师”（《论中德文化书》）。但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一知半解的。如他一方面说：“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毒物”（《太戈尔来华之我见》）。一方面又说：“我素来是信仰康德的伦理说，我相信人是有良心，而良心才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导者，顺着良心的命令而行动这便是‘率真的态度’”（《论道德与良心》）。可见他还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此后，他“眼看到中国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走，帝国主义日益嚣张，国内解放运动已经起来了。受这三方面的影响，于是思想开始感到烦闷：‘文学搞不通’，决定走另一条道路”（《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间，他决定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卡尔·马克思》）。郭沫若从政治经济学入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是找到了最好的门径。他译这书后确实受益不浅。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

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
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
了一个转换期。”“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马
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相信共
产主义社会终久能够到来：“个人之自由发展为万人自由发
展之条件的一个共同团体”，“是可以成立的”。他还发觉
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忽视了
政治方面的问题”，“不是马克思的本旨”。特别是他还注
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批判了以前“求自我的完成”、
“纯文艺”等观点。

郭沫若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还促进了他的
生活作风，生活态度的改变。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参加
调查江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混战的战祸，是他与“水平线
下”社会接触的开始。这次调查使他“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
认识了江南地方上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
的苛烈”。同时，这也使他由“昂头天外”到决心“把头埋
到水平线下，多过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
（《水平线下·到宜兴去》）。

郭沫若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后说：“我现
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在当时敢于以马克
思主义者自称，这是很有勇气的，但他毕竟还只是“初步转
向马克思主义方面”。“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必须是
“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的，而他当时对马
克思主义的学习还偏重于理论认识上。此后，他准备继续翻
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曾预定了一个五年译完《资本论》的计
划，并表示：“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劳死，要算是一种

光荣的死法。”但因书店老板认为“不便”出版而作罢。五卅运动爆发时，郭沫若投入了反帝的爱国斗争，经受了“炎炎夏日”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考验。血的事实，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本质的认识，同时，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抗斗争中，使他“于悲愤泣血之余，也闪出希望的光辉，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五卅’惨案怒吼》）。

五卅运动前后，郭沫若还与“孤军派”等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争，后来作者专门编为一集《盲肠炎》。我认为这组文章是郭沫若在思想战线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迎击敌人的一次英勇的尝试，表明他已基本上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奇怪的是近来有的人却对郭沫若参加的这次思想论争颇有微词。他们说：郭沫若这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糊涂认识和错误意见”，“认识相当驳杂混乱”，“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并得出结论：“郭沫若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若明若暗。”而其立论的根据主要是未收入《沫若文集》的两篇文章：《马克思进文庙》和《讨论〈马克思进文庙〉》。这种论证问题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恐怕是失诸偏颇的。马克思认为：正确的研究必须是从全部的材料中，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以得出结论。我们怎能撇开《盲肠炎》中那些文章不谈或少谈，而专就两篇佚文的某些论点立论呢？其次，即就两篇佚文的那些错误观点来说，也要具体的分析。郭沫若把马克思的学说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说成“出发点”“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孔子的“大同世界”说成“不谋而合”，甚至说马克思和孔子是“老同志”，这当然

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从作者的自述及佚文的内容来看，这确是一些“戏作”，“有点近于土八股——此其所以‘幽默’也”（《创造十年续编》）。故不好视为严正的论断。即使作者说这些错话是认真的，亦属简单类比的错误，

这是诗人的郭沫若常犯的错误，直到一九四七年，他不是还说过王安石的“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和“榷制兼并，均济贫乏”等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向老百姓学习”和“打倒土豪劣绅，使耕者有其田”吗（《历史人物·序》）？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他当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应当看到，郭沫若参加的这次论争正处于我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时期，北伐战争的前夜。当时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戴季陶主义者相呼应，叫嚷要在理论上摧毁共产党，其中“孤军派”由于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理论色彩，有一定的迷惑性。为了清除他们的反动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郭沫若则以《洪水》为阵地，与党在思想上的斗争相配合。

在这次论争中，郭沫若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述了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歪曲马克思的“工人无祖国”的含义，胡说“共产主义否认国家”。郭沫若即征引马克思原著，指出“马克思是承认国家的，不过他所承认的国家，决不是现在的建立于私产制度上的既成的国家罢了”。现在的国家“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护符”，“只能说是少数人的国